**祖父生平简介**

本文根据我祖父自己写的简历，亲人写的追思文章，本着还原祖父历史真相的思路，拜访现在与我祖父一起生活过的现已90多岁高龄的叔父刘勉吾，堂兄邓寄冰等亲属，并对现有资料包括网上流传的资料与在世的老人一一核实，并广泛查阅了现有的历史背景资料而书写的。由于时间有限，和个人经历和能力有限，很多方面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日后将进一步完善。

祖父刘武，字策成，1883年3月出身于湖南省邵阳新邵县寨脚下。

据堂兄刘经邦听老人回忆，我祖父“自幼聪慧过人，双目神光炯然，望之不严而威”。他自幼好学，年幼时即背井离乡去广西求学，就读于广西优级师范学校。祖父一直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很感兴趣，家里珍藏了很多书籍，如四书五经、史记等等。他在家时总是手不释卷。甚至上厕所时也要拿着书。看书看多了导致眼睛深度近视。除了看书之外，他还常写文章，作诗，写字。

据堂兄刘经邦追思我祖父文中提到“公操守廉洁，深恶贪婪之辈，曾著《戒贪》一文以警之。数十年政坛生涯，腿时依然两袖清风，家人仅得温饱免于饥寒而已”。因此祖父每次从政坛退出。为生活所迫，为保家人温饱均要重操旧业，到学校教书谋生。简历中祖父多次离开政界，无论担任多高的职位，任职时间有多久，几乎每次均重返学校教书都印证了他廉洁清贫的生活。自己随一身贫寒，由于祖父“一身好义，地方公益，莫不极力赞助，乡有求助者，皆推衣及食以应，抚孤恤怜，唯恐力有未迨。”他曾主持修建了寨脚下的刘家桥，自己在南京过着艰苦的生活，却回乡去创办田心小学。

1911年（清宣统3年）祖父在广西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就职于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员监督。

1912年（民国元年）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历史教员兼邵阳驻省中学教员。当时正值辛亥革命，民国政府刚刚成立，祖父亲身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消灭帝制创建共和的历史时期。

1913年祖父出任邵阳驻省中学校长。当时袁世凯已篡夺总统权力。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http://baike.baidu.com/view/8447.htm)密令武士英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以阻止国民党组阁，因而引发了国民党“二次革命”战争。祖父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知识分子，当时积极投入反对袁世凯卖国独裁的革命运动。祖父与教师李洞天，学生匡互生（字务逊，五四运动三个主要组织者之一）等人积极响应，组织反对袁世凯，宣传革命并筹备枪支倒袁。当时的湘督汤乡铭主政湖南，对倒袁运动进行血腥地镇压，在湖南大开杀戒，仅有名可查者多达两万余人，因而湖南人民称其为“汤屠夫”。

1914年春祖父和教师李洞天等人被湖南省督汤芗铭以参与倒袁，鼓吹革命以及蓄藏枪弹案拘捕，打入死牢，引起长沙学生罢课游行，强烈抗议。后来，蔡锷致电袁世凯和汤芗铭，鼎力相救，没有被判死刑，改为15年徒刑，教师李洞天不幸被汤处死。匡互生随后于1915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专攻天文学，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三个主要发起人之一。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不顾国人的反对，于中南海居仁堂登基称帝。1916年3月程潜向云南护国军借了一营兵力攻占了湖南靖县，自称湖南护国军总司令，在广西都督陆荣廷的支援下，程潜率部沿邵潭大道急速向长沙挺进。这期间湖南革命党人和工农群众，纷纷起义，，吓得袁世凯的走卒、湖南都督汤芗铭如坐针毡，急调湖南矿警督办郭人漳部守卫长沙。5月29日汤芗铭在其兄汤化龙亲至长沙的劝说下，宣布湖南独立，自己改称“湖南都督”，并接受广州军务院任命的抚军一职。湖南宣布独立后，祖父才被释放出狱。出狱时在监狱门口，受到长沙上千群众夹道迎接和庆祝，成为当时长沙家喻户晓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的英雄。后来，蔡锷称他：“身陷囹囫，而心系风云，时刻思念反帝斗争，有临死不屈之志，爱国热情溢于言表。”

出狱后。祖父仍返回第一师范继续担任历史教员。期间毛泽东正在第一师范读书，祖父担任过毛的历史老师。

1918年3月27日，张敬尧被段祺瑞任命为湖南督軍兼省長。这一人事安排自然遭到吴佩孚和馮玉祥的反感。而且张敬尧的統治手法偏向搾取式，表现得拙劣、腐敗，遭到湖南省社会各界反对。张敬尧实际支配的范围仅限于長沙及岳陽一带，直系及南方政府方面的軍人则在湖南省内各地割据。祖父因不满张敬尧盘踞的长沙，离开湖南第一师范投奔永州的谭祖奄。

1920年出任湖南浏阳县知事。1921年赴湖南衡山任县知事。期间毛泽东谋革新文化传播主义募集股份筹组文化书店，祖父响应以300大洋入股。1922年改任湖南郴州县知事。祖父在执掌浏阳，衡山及郴州三县县知事期间，从政清廉自持，守正不阿，勤政爱民。由于他秉性正直廉洁，大公无私，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深恶痛绝，经常和他们对着干，为当地办了不少好事，因此深受当地百姓爱戴，被人们称为“刘青天”，离任时当地百姓为他送万民伞，并刻碑记念，至今三地仍留有去思碑碣，以颂政德。

祖父1923年改任湖南省警察厅长，并负责将天心阁重建为公园。

祖父为人正直清廉，嫉恶如仇，对坏人坏事铁面无私，毫不留情。听父母亲讲过这样的一件事，在他担任警察厅长期间，发生了一起丫鬟被一名厅长欺辱她的亲属告到我祖父那里，祖父带警察去这个厅长家解救那个丫鬟，当场与那名厅长的警卫拔枪相向。最终将这名丫鬟救出。由于他经常不惧权贵，仗义执言，也使得一些人对他望而生畏，进而远之。他的做法深得民众拥护，但同时也招致一些官僚和军阀对他的不满。终于于1925年冬因为军人跋扈，很难处理案件，愤而去职。

祖父虽然长期为官，但是一直保持清廉，并无积蓄。所以每次离职均为生活所迫重抄旧业，靠教书为生。离职后重操旧业于1927年到1928年分别担任湖南孔道学校和南华学校的教员。

1929年出任省自治处主秘，省府顾问。1932年---1938年分别被推举为省水旱灾委员会常委、中央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湘抗灾委员会常委、长沙防空委员会常委、湘自卫军事参议院常委。在此期间，湖南省水旱灾害频发，继1928至1930年大旱，1931年大水之后，本年又成以旱为主、诸灾并发之大荒年。据我叔叔刘勉吾写的回忆说“在省敐救委员会工作时，经常不辞幸苦，到处奔波，要求拨款救济，减免克军杂税，并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捐款。那时洞庭湖一带经常闹水灾，偏远山区有经常闹旱灾。每逢灾荒，百姓流离失所，四处逃荒，疾病流行，死亡无数，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他总是全力以赴，尽力而为，廉洁奉公，洁身自好”。

1937年国民政府举行国会代表选举，初选由人民自由投票，我祖父虽未回邵阳参加竞选，没有料到竟然以得票第一位被选上，可见祖父在家乡深得家乡父老乡亲们的拥戴。复选改由政党圈派，不再投票，我祖父因受政党歧视虽然初选得票第一却被排除在外，经抗议后才列为候补国大代表。

1938年为因应日寇的进犯，国民政府采用焦土政策，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当时的计划是日军如果突破长沙 近郊的新河，则开始实施焚城计划，结果日军才过新墙河，距离长沙还有100多公里，第9战区司令薛岳还有重兵层层防御，长沙城内已经谣言四起，说日军已经 突破了新河，马上就进城了，1938年11月13日凌晨放火队随即全城放火，一系列偶然因素却让这场火灾变得完全不受控制，最终导致长沙3000多人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 毁。也让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1939年初长沙大火焚毁后祖父返回原籍。

叔父刘勉吾回忆1941年祖父已将近六十岁，当时身体不好，因生活所迫又到湖南省工专任国文教授职位，自己做饭自己洗衣，过着清贫的生活。

1943年又被推举为长救院产款清算委员。

1944年-1945年协助乡团抗击日本侵略

1946年冬因候补国会代表补缺赴南京出席国大会议，原以为可以为百姓做一些事情，不辜负家乡人民初选之意，但是到了南京后发现政治腐败，虚伪，贪腐肆孽，又见很多代表均因蝇营狗苟，四处钻营，是自己从未料到，被一些代表认为不合时宜。据我的堂叔父回忆，祖父有一次去广州时告诉他“解放前，他在南京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时，代表们在会上吵吵嚷嚷，闹个不休，会后花天酒地，只有他经常在街上买几个烧饼或几个烤红薯吃吃饭也只找小饭馆不进大馆。”由于看不惯政客和代表的虚伪，贪腐祖父后来就很少参加会议潜心钻研庄子，得以完成《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交上海商务印书馆签约出版。随后就返乡创办田心小学。

祖父在庄子的研究方面也非常出色，除了前面提到的《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之外，随后又完成了《章太炎庄子解诂驳议》一书，当时已年近古稀，身体状况逐渐恶化，已无能力运作出版，因此将手写稿存于国家图书馆。

1951年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聘为研究馆馆员。

1957年9月因患肝癌，医治无效于北京去世。